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The Intellectuals' Common Living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vestigated with Vernacular Novels Mainly

.....

明清士人的世俗生活

——以话本小说资料为中心

杨东方◎著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The Intellectuals' Common Living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vestigated with Vernacular Novels Mainly

.....

明清士人的世俗生活

——以话本小说资料为中心

杨东方◎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士人的世俗生活:以话本小说资料为中心/杨
东方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ISBN 978-7-5068-3455-1

I. ①明… II. ①杨… III. ①话本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6814 号

责任编辑/王卉莲 游翔

责任印制/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7.5

字 数/268千字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8-3455-1

定 价/52.00元

序

士人生活状况是一扇洞悉时代风云的窗口，前代学人推此窗者大有人在，且取得卓越的成果。当八年前刚刚成为博士生的杨东方甫一勾勒自己三年之后的果实时，已有王瑶先生的《中古文人的生活》、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等大作珠玉在前了。为此，我着实为这个弟子捏了一把汗：在这个已经成熟的领域，想作出新成绩谈何容易，但东方却确乎有了一种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决绝！

随着书籍一本本地翻过，随着笔记一章章地堆积，随着思考一天天地深入，随着交流一次次的深入，东方已经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果实，我也越来越踏实了。原来他不是想炒前贤的冷饭，而是要借前贤的酒瓶酿自己的新酒：东方的果实，是要利用话本小说中丰富的历史资料去研究明清士人的世俗生活。

明清士人的世俗生活，尤其是那些在科举路上奔波，未进入上层社会以及刚刚进入上层社会的士人，他们的世俗生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庞大的士人群体，是古代士人阶层的基层，蔓延、渗透于各个社会角落，活动其间，牵引、动摇整个社会的发展，透射出了繁复的明清社会。然而却往往因为正史的忽视、轻视乃至蔑视而隐匿在历史的背后。这对于士人阶层的全面考察、历史的完整再现以及一个社会阶层生活状况的真实呈现都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为此，东方想跳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甚至幻想主义，跳出“才子佳人”的思维窠臼，把一个原原本本的真实世俗生活摆在研究中，哪怕这个真实生活是那样灰暗、痛苦、滑稽、漫长、无望。在东方这里，是通过某些典型个案的整

理从而对一个阶层进行整体描述,因而他敏锐地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搜寻那个阶层的真实状态。然而世俗生活,包括最基本的日常衣食等生存条件的求取,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世俗生活方方面面,如果全面论述,势必非常驳杂,导致泛化和表面化,但杨东方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些问题,找到了一条主线,他仅仅研究科举生活、婚姻生活和谋生生活三个方面,具体而深入地把这样一个几乎只沉寂在各类民间记载以及小说中的阶层呈现在大家面前。在具体而微的考察和客观公正的叙述中,也新见迭出,如“新科进士的凄清岁月”、“秀才资格考试的物质支出”、“娶妻当娶儒家女”等皆发前人所未发,对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等相关研究者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而他所运用的主要资料,恰恰是他一直钟情的话本小说。话本小说,同士人生活状况一样,也是小说界研究的热点。早在1980年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和谭正璧先生的《三言两拍资料》就已成为话本小说研究的扛鼎之作。东方不满足于直接阅读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对竭尽全力搜罗到的话本小说进行全面阅读,细致分析,分类记录。不但如此,他还阅读了明清时期的几百种诗文集和笔记小说,来充实自己的研究资料。因为话本小说虽然以其展示生活的真实性、生动性而在小说中闻名,但那毕竟是小说,存在一定的虚构性,充满了作者的主观构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者甚至接受者的白日梦。比如明清社会中,在数量庞大的读书人中,不乏勉励读书的贫苦人士,对于他们而言,“变泰发迹”小说就是他们的白日梦。因而,为了使结论经得住考验,他引用了大量资料文献,不但几乎穷尽所有的话本小说,而且引用了好几百种诗文集笔记小说,在明清小说研究中引用如此之多的资料是非常少见的。

更重要的是,该书采用的文史互证方法,实际上是小说证史的方法。对于此种方法的操作,作者有自己的思考,特别撰写了“小说证史的几个问题”作为余论,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如此具有方法意识也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该书学术价值颇高,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可谓旧瓶酿出了新酒,我愿意推荐给大家!

东方2004年开始跟我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文学方向博士学位,他善读深思,学风扎实,多次荣获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学术优秀型),2007年顺利毕业,并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研究生(学术优秀型)。

同年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工作,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医古文研究会常委、秘书长。虽然他的学术重点已经转向到中医医史文献,但学术是相通的,相信未来他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于天池

2012年6月于北京

前 言

当今学界研究士人的生活，视域大抵集中在其诗酒酬唱、琴棋书画上。但这样的生活必定在世俗生活领域中取得支持，否则根本不能进行，故文人的世俗生活非常重要。非常可惜的是，由于诗文集及史学著作中这方面的资料较少，学界对此探讨亦不多。

笔者在2004~2007年跟随北京师范大学于天池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发现明清话本小说，特别是明末清初及以后的话本小说，保留了大量士人世俗生活资料，为此笔者写了两篇小文章，一篇是《明末清初秀才资格考试的物质支出》，一篇为《贡生的凄婉悲歌》，于老师见了之后大为支持。笔者从而决定全面爬梳话本小说的资料，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对士人的科举、治生、婚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具体的研究。

写作修改的甘苦只有自己才知。如《人中画·自作孽》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贡生出身的黄舆以儒学训导身份参加乡试进而中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个描写非常具体，应该是社会的真实反映。但在重读《明史·选举志》时，才看到：“其学校训导专教生徒……不许入试。”按此说法，小说中的情节是一种艺术的虚构。为了证实这种看法，笔者查了一些今人的科举著作，发现他们的说法要么和《明史》一致，要么不谈。于是，笔者完全放心了。然而，当后来读到《大明会典》其卷七十七发现《礼部三十五·贡举·科举·乡试》中明确记载，嘉靖六年，朝廷规定，岁贡出身的教职，工作三年且有成效，就可以在工作地点参加乡试。这就表明，贡生训导完全可以参加乡试。这样说来，话本小说的描写是真实的了。后来又翻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卷八《科举事例》）。他明言，嘉靖二

十八年后，“诸所称杂流者，已尽禁不与登贤书矣”。也就是教官这样的不入流官已经禁止参加乡试了。这样一来，贡生训导允许参加乡试的时间只可能在嘉靖六年至二十八年（己酉）这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也就是一时的规定，那么出自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的这个描写应该算为虚构，最起码有乌托邦成分。那么，是不是如此呢？后来读明·杨士聪《玉堂荟记》，发现这本书里记载了崇祯年间有人以贡生教官身份参加乡试并获得成功的例子。现在完全可以确认小说的这个描写是真实的。小说的一处描写，在确认其真实与否的问题上，笔者就经历了四次求证的复杂过程，而落实在论文里也就是短短的千字左右。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当然不是自夸下了多大工夫，而是讲处处皆学问，仅以几年的工夫打造的论文一定存在大量纰漏之处，故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后，笔者又对论文进行了修改。

直至今日，这部书稿已经过了8年的打磨。8年时间很长，从跟师学到为人师，但不变的是对此课题始终如一的爱！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第一章 士人的科举生活(上)	10
第一节 童生:读书的平民	11
第二节 秀才:诉讼与奢遮	19
第三节 贡生:凄婉的悲歌	27
第四节 监生:几般便宜处	36
第五节 举人:地位之变动	44
第六节 新科进士的凄清岁月	52
第七节 进士:仕途的宠儿	58
第二章 士人的科举生活(下)	68
第一节 秀才资格考试的物质支出	68
第二节 步步维艰的进学	75
第三节 辛苦难过的岁考	85
第四节 悲喜各异的科考	95
第五节 困顿重重的乡试	103
第六节 相对轻松的会试(殿试)	117

第三章 士人的治生生活	123
第一节 教馆：“治生之本”	124
第二节 作幕：“迫于饥寒”	179
第四章 士人的婚姻生活	201
第一节 择偶：娶妻娶德	201
第二节 联姻：当娶儒家女	213
第三节 惧内：文人的通病	229
余 论 小说证史的几个问题	247
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267

导 论

本书中的士人^①是指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类举子及部分科举游离者,他们是“介于庶民与公卿大夫(当时称‘缙绅’、‘乡绅’等)间的阶层”^②。也就是说,这里的士人不包括官员等传统的士大夫。但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论题的统一、深入,在行文过程中,文章对部分有明确功名出身的官员(如举人官、贡生官等)也时有涉及。话本小说则统指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而无意于“话本”和“拟话本”之区分。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鉴于当前学术界在士人生活、话本小说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与尚待填补的空白。

一、有关明清时期士人生活研究的现状

当前,有关明清时期士人生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以陈万益先生的《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③和孙立群先生的《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④为代表。《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为陈万益的一篇论文,收入其同名

-
- ① “根据日本学者酒井忠夫的研究,在明末,对那些以生员为主,也包括了举人的还没有成为官僚的读书人,就用‘士子’、‘士人’、‘衿士’等语称呼。”(见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但本文中的“士人”包含了进士这个群体。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与此相类的概念还有读书人、文人等等,本文对这些概念不做辨析,视为同一范畴。
- ② 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 ③ 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
- ④ 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版。

著作中,主要“探讨以山人为最突出群体的明季文人的生活,及其与晚明小品创作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为孙立群的著作,全书九章,共21万字,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活,主要包括士人的品格、士人的读书生活、士人与仕途、士人的衣食住行、士人的聚会结社、士人与琴棋书画、士人与青楼女子等内容。上述两部著作,虽一出自文学研究者之手,一出自历史研究者之手,但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即:第一,以大量的文学典籍为材料。第二,采用描述的写作方式。第三,关注士人的诗酒风流。《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认为明季文人“借怡于物”,对于山水、花木、禽鱼、书画、器具、蔬果、香茗以至风土、民情等事物,“晚明文人不仅以之寄感慨,并且以赏鉴态度安排,以突显其人品,气韵才情之出俗,高标其市井文人的风雅”,换言之,还是关注文人的风流人格。《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这个特点也很明显,通观全书有一种生命精神的流动,细观部分段落则为作家韵事遗事集。第四,在不同程度上使士人生活的研究落实到士人生活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联系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这一点比较明显,作者在同名著作自序中言“我认为晚明小品是明朝末年江南文化的产物,必须探究其生发的时空背景,了解明季文人生活的形态,才能具体把握小品纷繁歧异的样貌,进而给予正确的评估”,士人生活研究的目的不言自明,而《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第四章第三节第三部分“醉中得句若飞来——饮酒与创作”,就是谈的文学创作问题。如果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上述著作并无可议之处。但是,如果从士人生活的研究出发,上述著作则不免有所欠缺。正如龚鹏程所言:“文人生活的研究,以往甚少,而且颇为褊狭。因为视域大抵集中在文人的文坛交游、文艺活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以及诗酒酣唱、烟霞寄傲的部分,这是文人的文学生活,乃其本业,犹如商人从事其贸易、农人操其农事一般。……其次,就是文人的日常生活……就是他们与社会上其他各流品、各人等,农工商佣一样的衣食日用生活起居。这种文人的世俗生活状态,为向来讨论文人生活者所忽略。”他还说道:“大家忘记了文人也是人,也有其世俗生活的一面。而且正因为文人所从事的文学职业及其所追求之艺术生活品位,须要在世俗生活领域中取得支持,否则根本不能进行,故文人的世俗生活其实比

起其他行业人更为重要。可惜论者对此,殊乏关注。”^①

另外一个类型则以张仲礼先生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及其姊妹篇《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为代表。前书分四个部分:一是考察了 19 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和特征,二是量化统计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绅士人数,三是探讨了绅士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四是对 19 世纪中国绅士传记作了分门别类的分析。后书专门论述了绅士的收入问题,从担任公职、公共服务、充当幕僚、教书、经营土地、商业活动各个方面,考察了 19 世纪绅士收入的途径和性质,并比较了各种收入对于绅士经济生活的重要程度。与第一类型的著作相比,张著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不再以大量的文学典籍为主要材料,而以史学典籍,特别是大量的地方志为材料。第二,采用的也不再是描述的写作方式,而是论述的写作方式,这就使文章呈现出科学、严谨的特点。第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张著采用了数字统计的方法,如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二章分析 19 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时,共用了 29 个表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第一章分析担任官职作为收入的来源时,共用了 17 个表格。这些都体现出了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第四,不过,张著与第一类型的著作最大的不同则在于两者的关注点不同。第一类型的著作着眼于士人的诗酒风流,而张著则关注于士人的科举、谋生等一系列日常生活,使士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得以初步的呈现。这个类型的著作还有《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②、《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③等。作为严谨的历史研究著作,上述著作无可挑剔;但作为研究士人生活的著作,该类著作则不免有些缺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士人不是毫无生气的单纯存在物,他有精神,他有心灵,而这些是单纯的数字统计所无法告诉我们的。例如,科举制度到底对士人心灵上造成了如何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无从得知。通过那些谋生手段,士人在获得物质收入的同时,经历了哪些精神痛苦?我们也无从得知。总之,冰冷冷的数字背后掩藏着太多的悲欢离合、酸甜

① 龚鹏程:《文人的世俗生活——以〈聊斋志异〉来观察》,见《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62 页。

②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

③ 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年版。

苦辣,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那么,该如何从制度的研究(科举、婚姻方面)走向精神的研究?又该如何从物质的研究(治生方面)走向心灵的研究?这都是我们当前所应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现在亟需一部既关注于士人的世俗生活,又能在士人的世俗生活中见其精神、见其心灵的著作^①。这也正是笔者的努力方向之所在。

二、话本小说研究的困境

当前,话本小说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重源不重流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话本小说大量地流失海外,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博学如鲁迅、胡适等,尚不知道“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的存在。范烟桥《中国小说史》(1927年版)对三言论述不足300字,云“《喻世》、《警世》,今不可见”;在1930年修订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也语焉不详,称“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在此情况下,话本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到宋元话本上。其中,“白话小说的起源问题”、“《京本通俗小说》的年代问题”、“小说专名的考释问题”^②是其热点。随着三十年代中国学者海外访书的进展以及海外学者的介绍,“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进入了学者视野,并著入书目,整理出版。这种现象的出现对整个话本小说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我们试回想十五年前,我们讨论中国短篇小说,只能用一部《今古奇观》作例子;十五年来,‘三言’‘二拍’与《古今小说》(按,此处误,《古今小说》应为‘三言’之一)都先后出现,我们方才明白短篇小说在当时发达的状况;……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决不能真正明了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③从此,“三言”、“二拍”研究成为与宋元小说并驾齐驱的热点。建国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言”、“二拍”的本事源流上。其中,开风气者是孙楷第先生,他于1931年发表

① 顾鸣塘的《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虽以《儒林外史》为中心,但仍关注于制度和物质方面的研究,而对士人的精神和心灵关注较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② 参看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305页。

③ 胡适于1932年为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所做的序言。

《三言两拍源流考》一文^①；集大成者为谭正璧，他的《三言两拍资料》于1980年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建国后，学术界开始了对“三言二拍”的思想艺术研究，如范宁《冯梦龙和他编撰的“三言”》^②等。这样，话本小说研究就分为两大块，一为宋元话本，一为“三言二拍”，其代表作为孙楷第先生的《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③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④。孙文认为短篇白话小说经过“转变”、“说话”、“短篇小说”三个阶段，并认为其艺术上具有“故事的”、“说白兼念诵的”、“宜讲的”等特点，他立足文献，其文为“兼有史笔与分割辨析之长的著作”^⑤；胡著被赵景深先生誉为“精心结撰的、论断比较恰当的、内容丰富的、总结性的著作”，“对于说话及话本小说的发展过程，作了详细论述。”^⑥。但两者都有重源不重流的特点，前者全文七八千字，涉及明清话本小说的只有八百多字；后者共十八章，关于宋元话本以及说话的有九章，关于三言二拍的将近三章，其他话本小说总共不到一章，剩下的为说书和讲史等。这样一来，“源”几乎没有作品流传，只有靠文献推测；“流”有作品支撑，却不受重视。

随着《古本小说丛刊》（始于1987）、《古本小说集成》（始于1987）、《话本小说大系》（始于1989）的逐渐出版，这种“由于孤本秘籍难以尽览，研究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的论著，涉及的面一般都比较窄，往往只突出宋元话本、‘三言’、‘二拍’这三个点，连‘十二楼’也常常一笔带过，更不要说衰落期的那些拟话本小说了”^⑦的局面得到了局部改善，出现了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1994）、石麟《话本小说通论》（1998）、刘勇强《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新发展》、《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⑧等一系列论著，还有大量未出版的学位论文。另外，海外也出现了【美】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译于1989）、徐

① 收入《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② 《文学遗产》增刊第二辑。

③ 一九五一年《文艺报》四卷三期。

④ 像这种列名的专著，只在后面注明出版年代，不再另外出注，下同。

⑤ 杨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页。

⑥ 赵景深：《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序》，见《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⑦ 王毅：《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序》，见《话本小说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⑧ 《文学遗产》1998年06期、《文学遗产》2001年05期。

志平《晚明话本小说石点头研究》(1991)、《清初前期话本小说之研究》(1998)等优秀之作。但重源不重流的问题仍然存在,如2000年之后的几部专著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2002)共六章,除第一章总论和最后一章余论外,其他四章分别为宋元话本、“三言”、“二拍”、“李渔”;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2002)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宋元话本以及“三言二拍”,甚至李渔的小说都很少提到;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2003)共十六章,明以前占了七章,明清的词语各占一章,“三言”、“二拍”、“李渔”又各占一章,其他话本小说只占了三章,且每章都很短。

实际上,除了宋元、“三言”、“二拍”、“李渔”等作品外,现存的还有四十多部话本小说集,五百多篇作品,其篇数远远大于宋元、“三言”、“二拍”、“李渔”的总和。而且,部分作品在内容或艺术上并不逊色于我们公认的某些三言二拍名篇,如《豆棚闲话》在叙事上就很有特点,达到了话本小说叙事艺术的高峰,“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如果在《豆棚闲话》的起点上再向前迈进,那就要走进近代小说的范畴;”^①《鸳鸯针》则是一部“为《儒林外史》开了先路的”^②小说,其地位亦不容忽视。

总之,由于学术惯性等各方面的原因,大部分话本小说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对这些小说进行了梳理。发现他们提供了当时最原始、最本色的士人生活情态,故撰写了此稿。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把重点放在学人不太重视的中后期话本上,因为中后期描写士人生活的作品较多。据金敏镐统计,在“三言”、“二拍”与《型世言》的238篇小说中,以士人为主人公的作品一共是58篇,占24%^③;据闵惠敬统计,在清代白话短篇小说37种291篇中,以士人为主人公的作品一共是113篇,占39%。^④话本小说中士人主人公所占比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①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8页。

② 张俊:《清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③ 《中国话本小说变迁样相研究》,【韩】高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第225页,参见金晓民的博士论文《明清小说与科举文化的关系》,北京大学,2003年,第23页。

④ 《清代话本小说研究》,【韩】高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第91页。参见金晓民的博士论文《明清小说与科举文化的关系》,北京大学,2003年,第23页。

三、“世俗生活”释义及本文章节安排

一方面是应该对士人的世俗生活进行进一步研究,一方面是话本小说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如此看来,似乎是一切具备,只等动手操作了。实际上不然,在这里,还有一个“何为世俗生活”的问题。对此,提出加强“文人的世俗生活”研究的龚鹏程认为,所谓的“文人的世俗生活”就是“文人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就是他们与社会上其他各流品、各人等,农工商佣一样的衣食日用生活起居”。乍一看,这个解释好像解决了问题,实际上则不然,因为“衣食日用生活起居”包括方方面面,其内容斑驳复杂,实在不好把握。幸好,龚鹏程通过自己对《聊斋志异》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端倪。他言:

在文人的世俗生活领域,他除了受王权之宰制、经济市场之宰制外,同时也受到妻子的宰制。蒲松龄所描述的不第秀才,奔波于科举体制中,事实上属于第一类。甘心帖耳地钻帝王之轂。而且在这个体制中,毫无挣脱的办法,悲其境遇而莫能逃亦莫能离却。他所叙述的文人业贾现象,则凸显了文人受到经济市场之宰制,不能不去治生。至于那些悍妇对丈夫惨无人道的管束虐待,或丈夫叩服于女主座前之现象,就是文人受妻子牵制的写照了。文人的市井生活或世俗生活,就是深陷在这三重宰制中的。^①

这段话说的比较拗口,但基本提出了研究“文人的世俗生活”的线索,那就是从其所受的“三重宰制”入手。士人受“王权之宰制”指的是士人不得不参加科举生活,受“经济市场之宰制”指的是士人不得不治生,“受到妻子的宰制”指的是士人不得不面对日常琐碎的婚姻。相应地,科举生活、治生生活和婚姻生活也构成了“士人世俗生活”的三个最重要方面。笔者的研究也就从这三个方面入手,一一展开论述。

先看科举生活。首先,在一个功名化的社会中,大部分士人都要从属于一

^① 龚鹏程:《文人的世俗生活——以〈聊斋志异〉来观察》,见《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